



复旦博学论丛 第一辑

FUDAN BOXUE LUNCONG

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

■ 陈时龙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博学论丛 第一辑

FUDAN BOXUE LUNCONG

复旦

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

■ 陈时龙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陈时龙著. —2版.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1(2007.3)
ISBN 978-7-309-04873-5

I. 明… II. 陈… III. 学术思想-研究-中国-
1522~1626 IV. B2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00426号

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

陈时龙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史立丽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复文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125

字数 261千

版次 2007年3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9-04873-5/K·178

定价 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作者简介 …

陈时龙，江西永新人。1998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明代思想文化史，先后在（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报》、《复旦大学史学集刊》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参与或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课题三项。

… 内容提要 …

讲学之风是明代学术最突出的特点。包括朱子学、阳明学在内的明代理学，皆以讲学为其传播学说、交流讨论及学派建构的关键性机制。此风气发端于明初曹端、薛瑄诸人，而盛行于明代中后期湛若水、王阳明之后。阳明以不世之功业、澄彻之学问，演畅良知之学，激起讲学之风，延续百年。本书主要探讨明代百年间讲学的发展历程，以及讲学与政治、学术、社会道德等问题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政治、学术、道德诸问题与讲学的缠夹不清，以及带来的各种流弊，使百年间明代的讲学经历了一个由热情奔放、激情四溢的开放时代向含蓄内敛、相对封闭的保守时代的转变，讲学主流的道德感持续增强，宗旨由阳明学向程朱学回归，风气趋于保守，活力渐趋耗尽。

“复旦博学论丛”编印缘起

作为一流名校的出版机构，我们始终奉行打造精品的一贯理念，坚持弘扬学术的不懈追求。“复旦博学论丛”的推出，就是在认真回顾、不断总结我们已有实践的基础上，力图进一步完善这种理念和追求的尝试和探索之一。

任何一部真正有质量、有价值、有层次的学术著作，也许因为其涉及领域的专深而需求有限，但就构筑学术研究的丰碑大厦而言，则一定是不可或缺的砖石；也许永远不会像一般畅销读物那样普及风行，但从学术研究的历史发展视角着眼，却应该具有更加长久的存在价值；也许由于不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不符合出版产业的市场要求，但终将以其对学术的特殊贡献而成就出版文化的永恒功德。我们理解学术研究的艰辛，因而不敢辜负为之矻矻奋斗的作者；我们虽知学术出版的代价，但是决不推诿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为此，在进一步努力开拓、做好一系列更新品牌、更高质量的学术选题的前提之下，另从历年已经出版的各类相关著作中复加精选，集成“复旦博学论丛”，以全部统一的版式装帧、若干必需的内容校订和尽量考究的工艺制作，

分辑再版重印。它们中既有先后分获诸如“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全国高校优秀学术著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市优秀图书奖”等各类学术、图书奖项,为学界肯定认可者;也有因初印数量不多,而售罄之后又有良好反映评价和陆续不断需求者;还有作者虽然已经不幸辞世,我们欲重印其开创立说、流风及今的代表力作以感念其献身学术、支持出版之高谊者。总之,它们既是我们长期以来努力坚持,与几代学者风雨同舟、甘苦共享的合作见证,也是我们多年之中脚踏实地,和全体同仁不断进取、精益求精的部分积累。

值此“复旦博学论丛”问世之际,我们还要借此机会,再次衷心感谢所有一贯信任、支持我们工作的全部作者,同时衷心感谢众多关注、鼓励我们事业的广大读者,并且也衷心感谢长年恪尽职守、默默奉献的社内同仁——没有他们,我们将一事无成。

为了我们坚信的理念,为了我们坚持的追求,为了我们坚守的职责,我们希望尽力做得更多更好;因此也期盼来自各方的批评指教。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年12月18日

序 言

樊树志

明代前期、中期的思想界沉闷而无新意，科举取士主要以宋儒朱熹的经注作为考试的标准，致使朱学风靡一时，学者们依托于复性和躬行，没有自觉、自由的思想。物极必反，于是乎有陈献章、王守仁的理学革命，希望把个人的思想从圣贤的经书中解放出来。陈献章的“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的主张，开自有思想的先声；而王守仁以己心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拒绝拜倒在圣贤脚下，更是思想界的一大革命。此后，人才辈出，都以追求思想自由为旨归，形成波澜壮阔的个人主义与博爱主义思潮。对此，美国学者狄百瑞首先作了精深的分析。这对于长期以来把王学斥责为“主观唯心主义”的中国学术界，不啻一帖清醒剂。

王守仁的心学最可贵之处，就是强调“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而不必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学者们走出书斋，各抒己见，讲学成风，各种讲会遍布大江南北，蔚为壮观。

陈时龙的博士论文《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参考前人吕妙芬、陈来、吴震等人的研究成果，以实证史学的方法，在广泛收集地方志和讲学者文集的基础上，对这一个世纪的讲学和讲会活动的历史进行梳理与重建。这无论对于学术史、

思想史,还是对于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都是极有意义的。

由于清初流行宋学,以后又流行汉学,学者们对于明代中晚期的讲学与讲会,似乎嗤之以鼻,以至于影响到近代学者。日本东洋史学的奠基人内藤湖南就曾指出:到了明末,学者间出现了一种新风气,即讲学(讲会)。讲学并非讲述学问,而是以学问为讲演的材料而已,然后进行禅宗式的问答,在口头上空泛地讨论学问。顾炎武、黄宗羲反对这种讲学风气。顾炎武的学术秉承了宋学精神,又是清代汉学的鼻祖,他的见解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这就给陈时龙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充分发挥的空间,而且他确实作了出色的发挥。明代中晚期的讲学运动毕竟有它的历史地位,给当时及后世奉献了一笔可贵的思想财富。问题是需要分析讲学风气盛行百年之后为什么衰微了?衰微的原因是什么?他指出:明代中晚期百余年的讲学活动,是一个由开放走向内敛的过程,这个内敛的过程是与16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政治、学术、社会诸因素相关的。万历初期的十年,最高当局对于书院讲学的打压,不仅导致讲学趋于低潮,而且使以后的讲学者如罗汝芳、耿定向等人,把讲学的重点转向对道德的重建与维护;而东林学派的讲学更深入到学术道德的整顿,使后期讲学活动显得相当内敛,讲学宗旨向程朱正统回归,讲学风气趋于保守,讲学网络由全国性走向区域性。

全书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作为附录的“16—17世纪徽州府的讲会活动”,以五万字的篇幅全文发表于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二十期(2003年)。该文对从嘉靖到康熙的二百年中徽州府的讲会活动进行细致的实证分析,在资料收集、爬

梳、整理上,花了很大的工夫,力图再现当年讲会活动的具体实态,由阳明学激荡讲会之风,经湛若水、邹守益和王畿、祝世禄和潘士藻、汪应蛟和余懋衡、汪佑和施璜五个阶段,以阳明学开启,而由朱子学收尾,由小见大,基本上反映了全国性的讲学与讲会活动的走势。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指出:清代皖派朴学,就是由逐渐在徽州府讲会中取得优势的朱子学中脱颖而出的。

历史是在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满足于先入之见,以偏概全或一言以蔽之,难以复原历史的真相。明代中晚期的讲学与讲会,当然有“禅宗式的问答”,有“在口头上空泛地讨论学问”的倾向,但是也不尽然。东林学派的讲学与讲会,就注重四书的章句之学,不满于王门后学那种“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空疏学风。后期徽州府的讲会,与东林学派回归朱子学相呼应,开启了皖派朴学的先声,则又是另一个明证。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阳明学的流行,加速了儒学的通俗化。在这种背景下,讲学活动成为一种时代风气,成为这一时期思想史的主题。因此,对于那个时代丰富多彩的讲学与讲会活动的研究,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陈时龙的专著,对于有志于研究明代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较完备的参考文献,也提供了一种新的启示。

陈时龙博士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这个人才荟萃的学术圣殿,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希望他继续发扬刻苦严谨的治学风格,不断攀登学术高峰。

2004 年圣诞于复旦园

目 录

序 言	1
绪 论	1
第一节 讲学与讲会	2
第二节 明代讲学的相关研究	16
第一章 兴起：16 世纪初期王阳明等人的讲学活动	34
第一节 正德及嘉靖初年阳明学的处境	36
第二节 王阳明及其门人对讲学模式的探索	48
第三节 湛甘泉、吕柟的讲学活动	58
第二章 高潮：嘉靖年间阳明后学的讲学活动	72
第一节 地域讲学：以安福县的讲学为例	76
第二节 大型讲会：青原会与水西会	84
第三节 同门大会：冲玄会与怀玉会	93
第三章 挫折：隆庆及万历前十年的讲学与反讲学	101
第一节 徐阶倡讲学	103
第二节 高拱反讲学	113
第三节 张居正禁讲学	122
第四节 论政治与讲学	140
第四章 反思：耿定向及其门人的讲学活动	148
第一节 世界心重：论耿定向	150

第二节	修德正俗：论刘元卿	159
第三节	圆宗方矩：论管志道	172
第五章	回归：东林讲学与讲学宗旨之变化	183
第一节	书院、文社及同善会	185
第二节	从个人讲学到丽泽约	196
第三节	讲学之宗旨：尊朱与尊经	211
第六章	终结：首善书院之讲学	223
第一节	首善书院始末	224
第二节	融门户以偕大道	231
第三节	讲学与党争	239
第七章	旁系：泰州学派的讲学运动	251
第一节	王艮与王栋	252
第二节	颜钧与罗汝芳	260
第三节	何心隐与李贽	269
结 论		277
第一节	讲学的两系：学院式讲学与庶民式讲学	277
第二节	从开放走向内敛：中晚明讲学风气的变迁	283
附 录	16—17 世纪徽州府的讲会活动	292
第一节	徽州府讲学的湛若水时代：1536—1549 年	295
第二节	徽州府讲学的王学时代：1550—1575 年 ...	301
第三节	徽州府讲学的复兴：1588—1603 年	308
第四节	徽州府呼应东林的讲学：1604—1625 年 ...	320
第五节	明末清初徽州府的朱子学讲会：1628—1735 年	329

第六节 徽州讲会的类型：六邑大会和四府大会	338
第七节 徽州讲会运动与明清学术转型	347
征引书目	353
后 记	374

绪 论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说：“尝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程朱之辟释氏，其说虽繁，总是只在迹上；其弥近理而乱真者，终是指他不出。明儒于毫厘之际，使无遁影。”^①明代的理学比宋代理学高明的地方，在黄宗羲看来，就是明儒能够对于哲学中各种概念的细微差别作出辨析。从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一种学术思想当其初创时总是具其规模气象而不缜密，到后来才渐渐趋于细节的分疏。明代理学上承宋元理学，处于理学发展的末期，其哲学思考趋于缜密，当属自然。然而，明儒“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的功力哪儿来的呢？自然一方面是学术积累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学者之间的辩论和相互启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明代学者之间面对面地讨论，在当时有一个比较时髦的术语，即“讲学”。清儒程嗣章说：“明代道学，固不及洛闽之醇，而穷经通儒，亦罕闻焉。独讲学之风，较前代为盛。”^②这句话，倒是比较精练地概括了宋、明、清三朝学术风气的区别：明儒既无宋代道学的醇正，又无清代经学的穷通，独有

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明儒学案》，页5。

② 程嗣章：《明儒讲学考》，页1。

讲学之风,蔚为大观。吴震先生也说:“在 16 世纪的明代知识界,‘讲学’本身俨然成了一种社会时尚或时代风气。甚至可以说,讲学活动构成了这一时期思想发展史的一个主要话题。”^①与“讲学”二字相关联的,还有“讲会”二字。讲会即讲学之会,也就是说大量的学者定期聚集在某个地点一起讨论哲学问题。讲会正是讲学风气发展到明代而臻于高峰时的产物。当然,对于讲学、讲会的定义和内涵,及其与明代社会的关系,不能不详加讨论。

第一节 讲学与讲会

首先,怎样理解“讲学”的含义?从字面上看,“讲”就是“言说”,就是通过语言表达而传送某种信息。无疑,这种信息就是“学”。因此,理解“讲学”的确切含义,关键在于了解不同时代讲学活动中的“学”之所指。也就是说,“讲学”这一概念的内涵随着学术变迁而发生变化。当然,大体上说,讲学是一种教育活动,可以是较高层次的学术切磋,也可以是较低层次的教化活动^②;可以是官方性质的讲学^③,也可以是私人的讲学。然而,官学数量的有限和效率的低下,使私学成为古代学者获得知识的

① 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学林出版社 2003 年版,页 3。

② 吴震先生《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所谓讲学,从狭义上说,无非是学者之间的一种学问切磋。从广义上说,讲学无非是一种教育、一种面向民众的教化活动。”(页 36)

③ 官方讲学,以明代为例,从最高统治者接受教育的“经筵”、“月讲”,到国子监的教育活动、地方官学的教育活动,皆可谓之讲学。

主要途径,而官学充其量只是一个资格或出身而已。因此,“讲学”在很大层面上是指“私人讲学”——据说创始者即孔子。

讲学始于孔子,是后代儒家的主张。晚明学者顾宪成就说:“讲学自孔子始。”^①儒家学者视孔子为私人讲学的首创者,是将“讲学”视作“儒学的讲学”。当然,何心隐就说,学与讲,其实可以溯源至伏羲、尧、舜、文、武等圣人,“又奚惟原于孔子而始有学名以名其所学,始有讲名以名其所讲耶!”^②其实,私人讲学的发生,可以追溯至西周的村塾。陈青之先生以为,《礼记·学记》郑注中“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朝夕坐于门,门侧之室曰塾”的话,描述的就是归乡的士大夫在乡里讲学的情景^③。这大约可视为最早的私人讲学。春秋时期,讲学者也不止孔子一人。道家和墨家的讲学活动,都比较频繁。孔子讲学,不过诸家之一。不过,“讲学”的出典,却似出于孔子语录《论语》。《论语·述而》中记载孔子的话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后来的儒学传授基本上就是在“修德、讲学、徙善、改过”八字上作文章。清儒汪中解释“学之不讲”四字说:“讲,习也。习,肄也。古之为教也以四术:书则读之,礼乐同物,诵之,歌之,弦之,舞之,揖让周旋,是以行礼。故其习之也,恒与人共之。学而时习之,有友朋自远方来,所谓君子以朋友讲习也。……孔子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鲁诸儒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皆讲学也。”^④按汪中的解释,“讲学”就是“学习

① 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十四,广文书局1975年影印本,页80,转引自吴震《阳明后学研究》,页423。

② 何心隐:《原学原讲》,《何心隐集》第一卷,页5。

③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页31。

④ 刘宝楠:《论语正义·述而第七》,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版,页136。

并实践礼、乐”；“讲”不只是简单的口耳相接，讲的内容“学”包括一切与人的社会活动相关的礼仪和物事。这样的解释，可能确实是真实地反映了孔子对于“学”的理解，但也许更多地体现了后儒对“讲学”的理想化解释。在躬行实践的学者看来，儒家当注重实际，即事即学^①。因此，“讲学”只是一种实践，而不是高谈阔论。但是，理想化的解释毕竟与历史事实相距甚远，事实上，讲学即是“口耳授受之习”。典籍之难得、学术之垄断，是口说传业以讲学发达的背景。葛志毅先生说：“先秦至西汉，口耳授受是其时各家通得的学习传习方式。”^②其实，即使到明清，乃至今天，口耳授受之“讲学”也必不可少，变化着的只是讲学的模式而已。

孔子的讲学，是“一种流动式的讲坛制”^③。孔子门人众多，讲学甚久，但没有固定的讲坛。他的学生多半随从他四方游历，一面游历，一面讲学。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即说孔子曾与弟子们习礼于大树下。《庄子·渔父》说：“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据说，杏坛只是“泽中高处”^④，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讲学场所。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各讲其学。孟子师子思，讲“仁义”、“性善”，辟杨朱、墨翟。孔孟之后，儒家讲学进入一个潜伏的时期。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初年，

① 明代学者吕柟就曾对弟子们说：“汝辈今日在此讲论，不消拘拘于经史上。即如今日用应接上下，或言语衣服，却都是学。故当时曾子、子夏讲论时，常说今日某人行冠礼差，又说某人行丧礼差，一一在这上面考究。今人说及此，便以为粗述了。”参见吕柟：《泾野子内篇》卷十四，中华书局1991年版，页138。

② 葛志毅：《今文经学与口说传业——试析古代的讲学传业方式及其文化历史原因》，《历史教学》1994年第5期，页6。

③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页53。

④ 王先谦：《庄子集解》，诸子集成本，页205。